

浙江词学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朱惠国¹

【摘要】词的创作在浙江一直十分兴盛。宋以来，浙江词人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取得的成就也十分突出，逐渐形成良好的词学传统。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从大的方面分析，主要有三条：其一，杭州为南宋都城，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这从作者层面为浙江词的创作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二，浙江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和人文环境均有利于词的创作，这为浙江词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三，浙江词人普遍追求词艺，推崇风雅，与词的美学本质最为契合。浙江词学传统是浙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浙江词学传统的研究，发掘其现代文化价值，将其融入到浙江现代文化的建设之中。

【关键词】浙江词学 词学传统 文化建设

浙江地处东南，历来为人文渊薮之地。就文学而言，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各种文体的创作均十分发达，但若说有特点、有传统，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词是非常突出的一种。相比于诗、文和赋，词的形成时间较晚，而且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非常大，但这种文体在演化过程中，其本身的体性特点与中国南方的文化比较契合，因此在南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浙江总体上处于南方文化圈，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地区，杭州又在南宋时成为都城，汇聚了全国的文化精英，这就使词的创作在浙江一直十分兴盛。两宋时期以及之后的历朝历代，浙江词人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取得的成就也十分突出，逐渐形成良好的创作传统。时至今日，在发掘与弘扬浙江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浙江文化精神的背景下，重新阐发浙江的词学传统，研究其特点和形成原因，探讨其融入浙江现代文化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浙江词学传统的历史追溯

词的创作在浙江出现较早，起点也比较高。¹但在唐及五代时期，相比于西蜀、南唐这两个词学中心，浙江词的创作并不算很兴盛，总体成就也不突出。浙江词创作的繁盛，主要是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关于浙江词人在两宋时期的创作风气以及在全国词人中的比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很有参考价值。唐先生根据当时手头占有的材料，对两宋间有词留存且籍贯可考的871位词人作了考证，“按省分列，藉以观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871人中，浙江省216人、江西省158人、福建省111人、江苏省82人、河南省68人、四川省61人、安徽省46人、河北省34人、山东省32人、湖北省17人、湖南省17人、陕西省14人、山西省7人、广东省6人、广西2人。²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浙江的词人数量最多，差不多占到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远远超过第二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发表时间较早，此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又有不少词人的信息得以完善。近年有学者根据朱德才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宋词》等材料，对两宋浙江词人的人数、作品数和省内分布情况重新作了统计。其统计结果为“两宋时期，浙江地区共有词家237人，占全部宋词作者1539人的15.4%；共有词作4716首，占全部宋词作品21203首的22.24%。”³该项统计由于用了新的材料，更加准确，而且统计项目包括词人和词作两个方面，也更全面。就词人数量而言，虽然浙江词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从216人增加到237人，但在全国词人中的占比数却明显下降，从24.8%左右下降到15.4%，这可能是其他省份新发现的词人数增加更多的缘故。但从作品的角度看，浙江词人的作品数占比在22.24%，依然接近四分之一，这说明浙江词人的人均词作数较高，创作比较活跃。可见在两宋时期，浙江词人不仅人数众多，作品数的占比也非常高，是当时词坛非常庞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群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词人和作品的数量是一个地方词风兴盛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创作的质量和在词坛的影响力也十分重要。关于两宋浙江词人的创作，目前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部分是词人的个案研究，如周邦彦研究、吴文英研究、张炎研究、王沂

作者简介：朱惠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孙研究等等，总体上偏重于阐释词人个体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这些成果合起来看，也能说明浙江词人的总体成就与词坛地位，只是还不够专门，也不够充分。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浙江词人在两宋间的词坛地位与影响力，我们不妨参看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以及相关的论述。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最重要的理论家，其词学观点对晚清以及民国词坛的影响非常大。其所著《宋四家词选》原名《宋四家词筏》，兼有理论倡导和创作指导的双重功能。⁴该选本的序文被唐圭璋先生单独辑出，视为词话，以“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的标题收入其《词话丛编》。此一选一论，一直被视为清代常州词派的经典著作，有较大影响。《宋四家词选》虽名四家，其实是宋词的选本。其体例比较独特：选取两宋间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词人单独列出，然后将其余词人附在四人名下。这四人分别是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周济以为，“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膺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⁵在此基础上，他还指出学词的正确途径，认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又说：“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⁶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周济在此并非简单地列出宋词的四种风格类型，也不是仅仅指点学词的方法和途径，从他“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的表述看，他显然是将此四家视为有宋一代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词人。第二，这四人也不是简单地处于一个平面，周济以为，周邦彦的词达到了创作的最高境界，所谓“以还清真之浑化”“清真，集大成者也”，就明显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当然，周济主要是从词艺的角度来看问题，并非对宋词作高下排名，但这四家在两宋词坛的地位和影响，的确得到了词坛的认同。四人中，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均为浙江词人，可见浙江词人在两宋词坛的实际地位与影响。除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戈载的《宋七家词选》也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词选。戈载与周济是同时期人，为吴中词派的代表性人物。戈载精于词律、词韵，其《词林正韵》为词学经典著作之一，影响甚大。《宋七家词选》选词偏于雅正，于声律方面要求尤严。所选七家分别为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其中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四人为浙江词人；周密祖籍济南，但出生于浙江。周济《宋四家词选》和戈载《宋七家词选》均是晚清、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词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词坛对两宋词的基本评价。由此看，浙江词人在两宋的创作成就和实际影响力的确非常特出。

元明两代词的创作总体较弱，但尽管如此，浙江词人与同时代词人相比，还是显得比较突出。⁶清代为词的中兴时期，浙江词人的创作成就与词坛影响力非常明显。可以简要地谈两点：第一，清初浙江词学家查继超编《词学全书》，对推动词的创作风气有重要作用。《词学全书》包含四种词学著作，即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赖以邠等《填词图谱》、仲恒《词韵》。这四种词学著作均为浙江词学家所编，其中后两种具有工具性，为词的创作提供方便。学界以前对《词学全书》的关注度不高，主要是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着眼，但如果从普及词学、推动词的创作风气这一层面看，《词学全书》的贡献不容忽视。我们需要对《词学全书》的价值与实际作用重新作出评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词学全书》的编纂并非是孤立事件，它其实是晚明以来，浙江地区词风兴盛的一个缩影。第二，浙西词派是清代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词派。晚清民国时期，张德瀛和蔡桢等词学家在清代落幕或即将落幕之际，都对清代词坛作过宏观描述，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晰看出浙西词派的贡献以及对清代词坛的影响。张德瀛《词徵》将清词的发展概括为词风的三次变化，他说：“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⁷这里第一、第二次词风转变，都有浙西词派的参与。第一次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人物朱彝尊与阳羨词派的陈维崧等人一起，改变了明以来的词风；第二次是浙西词派的中期领袖人物厉鹗崛起，确立了浙西词派在词坛的主流地位，所谓“世称大宗”。蔡桢《柯亭词论》则从词派的角度，将清词划分为三期，他说：“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羨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羨派倡自陈迦陵，吴兰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⁸蔡桢看重清代中后期，将桂派从常州词派中区分出来，并给予很高评价。两人虽然对清代词坛有不同的划分法，但都对浙西词派的地位予以肯定。浙西词派影响了大半个清代词坛。

浙江词人对民国词坛的影响也很大。湖州人朱祖谋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入民国后，成为公认的词坛领袖。朱祖谋去世后，现代三大家崛起。三大家中，夏承焘是浙江词人，龙榆生则为朱祖谋的衣钵传承人。

二、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

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从大的方面分析，有三条比较明显。

第一，杭州为南宋都城，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这从作者层面为浙江词的创作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南迁，都明显地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就浙江词的创作而言，“靖康之变”后的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对其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南宋时的杭州，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这为词人的汇聚及其创作活动提供了极佳的社会环境。浙江词人数量在两宋时期位列第一，与杭州作为南宋京城特殊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在地域上的迁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上层人士随政府机构一起流动，这些人士或是朝廷官吏，或是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其他文化人士。他们的迁移，一般都会直接带动迁入地经济、文化的繁荣。杭州自钱镠以来，素有“东南第一州”之称，北宋时又得到发展，自身的基础相当不错，绍兴八年（1138年）成为“行在所”后，“輦轂驻蹕，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⁹关于南渡以及之后一段时间“衣冠纷集”的情况，史料记载甚多。如《宋史》记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¹⁰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大驾初驻蹕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¹¹他又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中说：“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¹²此类史料很多，也经常被引用。除了南渡中直接追随高宗而来的各类人物外，其他地方的人物也往往受都城吸引，不断前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大理评事莫蒙“论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¹³凌景夏说得更加详细：“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蹕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¹⁵从这些资料看，杭州成为都城后，人口快速增加。

这些新来人口成分多样，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文化层次和物质基础的精英人士，上述材料中“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流动与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提升了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环境。从词的创作看，这些精英人士，尤其是朝廷官吏、寓居的文人和应试的举子，都是创作的重要力量。夏承焘先生在《西湖与宋词》里说：“那时南方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到过这个京城来应试服官，我们翻检南宋一代词人的历史，很少人是不曾逗留过西子湖边的。以里籍说，南至闽、粤，西至滇、蜀，也有来自北方沦陷区的。以社会地位说，上从将相公侯，下及僧道妓妾，无所不有。”¹⁴夏先生这段文字虽然着眼于西湖与词人的关系，但也说明了杭州对四方词人的吸引以及他们在杭州的创作情况。专门研究移民史的吴松弟先生也谈到过外地文人在杭州的创作情况。他依据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关西湖诗社的记载，认为该社是“一些流寓临安的外地文人”和“当地文人”一起组织的。他还说：“临安还有猜谜、写诗的团体‘南北屋斋’、‘西斋’，耐得翁说这些团体‘皆依江右’。‘皆依江右’一语提示‘南北屋斋’和‘西斋’的成员可能大部分来自江西”¹⁵。这里虽然是在说猜谜、写诗社团的构成情况，但词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外地文人在杭州，乃至浙江地区的创作非常普遍。有的文人长期居住浙江，慢慢融入浙江，本身也成为浙江词人的一部分。可见，杭州作为南宋都城，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这对推动浙江词的创作以及形成浙江词的创作传统有重要作用。

第二，浙江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和人文环境均有利于词的创作，这为浙江词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词最初是一种音乐文学，具有音乐和文学的双重属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音乐性和文学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看，呈现出音乐性不断下降、文学性逐步增强的过程。这期间，环境对词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当词作为一种流行歌曲主要用于歌伎的演唱时，繁华的都市以及与之相关的享乐之风对词的创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当词的音乐性减弱乃至消失后，自然风光、经济状况以及人文环境对词的创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浙江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在这两个阶段均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从第一阶段看，浙江的杭州作为繁华都市，加上优美的自然风光，无疑对词的创作与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白居易居杭时，他就常常宴宾客，听唱曲，极欢而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

曲，布浹郡中。”¹⁶杭州的生活，给白居易留下深刻印象。他著名的《忆江南》三首，其中第二首“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就是专门写杭州的。钱缪以后，杭州更加繁华，到北宋时，已有“东南第一州”之誉。“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¹⁷柳永的名作《望江潮》（东南形胜）对此也有所反映。传说“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¹⁸，虽为杜撰，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杭州的繁华与秀美。繁华的杭州为词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其本身也成了词中描写的内容。南宋的杭州是京城，更加繁盛。对此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等均有记载。虽然这时期词的音乐性已经减弱，歌伎的商业性演唱减少，且作用也不如北宋，但京城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氛围依然为词的创作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环境。这从南宋浙江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词乐消失后，词基本上成了一种案头文学，这时浙江优美的自然风光、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深厚的人文底蕴为词学传统的延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史·地理志》曾对北宋两浙路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民情风尚有过一段精练的描述：“（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杭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²¹宋代两浙路的范围与现在浙江不同，但大致包含了现在的浙江地区，因此这一段描述反映了浙江当时的基本情况。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浙江区位优势、生活富庶、人性柔慧，且与外界也颇多交往。宋以后，这些特点依然存在。这些均是浙江词学发达的基本条件。至于人文底蕴，浙江原本的基础就不错。南宋人叶适曾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¹⁹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大致反映了这些地区右文重道的风气。南宋后，浙江的文化气息更为浓郁，读书重道、诗书传家等传统也更加深入人心。浙江方志在谈到当地读书风气时，曾提到青田地区“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²⁰。这话同样有夸饰的成分，但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的读书风气。这种人文环境对词的创作极为有利。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浙江词人辈出，创作风气浓郁，均与这种人文环境有关。随举一例。嘉兴王店，古称梅里，为浙西词派的发源地，“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人词客，代不乏人”，以致“天下之称诗词者，必举梅里”²¹。究其原因，清初梅里词人王庭曾对这里的人文环境有过一段描述，他指出，梅里地方虽小，但“材智辈出，文章驰誉者，略有数家。至于束修闭门之彦，勤勤著书，日见累积”²²。可见良好的人文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也非常重要，这是创作的物质基础。仍以梅里为例。晚清薛时雨说：“浙西多词家，而盛于嘉禾。其地本水乡，烟波渺瀰，极鱼蟹菱藕之饶。而城南鸳鸯湖，澄莹如镜，尤占其胜。水泽之气，灵秀钟焉，故词人往往杰出。自长水塘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呜呼盛矣。”²³他认为，这里词学兴盛，“岂独渊源有自，抑亦其风土使然欤”²⁷。可见，优美的风光、富庶的百姓、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浙江词学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三，浙江词人普遍追求词艺，推崇风雅，与词的美学本质最为契合。

浙江词人的创作风格各异，但大而言之，普遍精于技法，追求风雅。无论是北宋的周邦彦，还是南宋的吴文英、王沂孙、张炎、高观国等，都以词艺精深著称。南宋的风雅词派，浙江词人占了大部分。姜夔虽非浙人，但也和浙江渊源颇深。他曾居住于湖州，其号“白石道人”即来自于弁山苕溪的白石洞天，中年后移居杭州，并最后终老于此。南宋风雅词派历来受到很高的赞誉，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词语典丽、格调高雅、声律谐婉，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此，学界已有太多研究，无需赘言。

清代以浙西词派为代表的浙江词人继承了南宋风雅词派的创作传统，同样以讲求词艺、推崇雅化著称。浙西词派形成的一个重要词学背景，就是明词的不振，一方面是“花草词风”盛行，另一方面是创作的失范。在浙西词派看来，这两条均背离了词的雅化原则。朱彝尊以为，明代流行的《草堂诗余》在古词选本中“最下”，但“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²⁴。针对明词的失范，他明确提出批评，认为“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²⁵。为了改变这种词风，他提出要学南宋，学姜张，希望用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风雅词来规范词的创作。在他看来，南宋词格高调雅，精美成熟，代表了词的最高境界，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²⁶。除了朱彝尊，浙西其他词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如同为浙西六家之一的李符就有“词至晚宋极变而工”²⁷的说法。浙西词派另一大家汪森则说得更加明白，“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练，归于醇雅”，“譬之于乐，舞《箛》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²⁸。他们认为，通过学习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风雅词，可以使词的创作重新走上雅化的道路，“归

于正始”。

学习南宋、讲求词艺、追求雅化是浙西词人普遍的词学观念。他们不仅倡导这种词学观，还身体力行，将这种词学观念体现在实际创作中，形成一种风气。朱彝尊《静惕堂词序》在表彰浙西前辈词人曹溶的词学功绩时，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又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²⁹。“家白石而户玉田”固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也可看出浙西词人的词学追求和创作风气。为了更好地学习南宋雅词，浙西词人还列出一份具体的词人名单。如朱彝尊在《黑蝶斋词序》中就列出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等人，以为这些词人“皆具（姜）夔之一体”³⁰。汪森《词综序》也罗列了具体的姜派词人，但基本上是沿袭朱彝尊的，只略作增删。浙西词人自觉或不知觉地学习这些词人，用以提高自己的词艺。李符在谈到另一浙西词人龚翔麟时，认为其词“大率以石帚为宗，而旁及于梅溪、碧山、玉田、蘋洲、蛺岩、西麓各家之体格”³⁵。说明清代浙西词人确实是以姜夔等人作为自己学习对象的。他们自己的创作尽量向这些南宋风雅词靠近，追求醇雅和规范，在艺术上取得很高成就。

三、浙江词学传统如何融入现代文化建设

浙江词学传统是浙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浙江现代文化的一大优势。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这一文化遗产，并将之融入到浙江现代文化建设之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将词学传统融入浙江现代文化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比较切合实际的，首先要做的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浙江词学传统的研究与弘扬。

浙江词学传统十分深厚，如果从两宋到晚清民国总起来看，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肩。这是浙江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我们要加强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弘扬。从历史上看，浙江词人出于对浙江地域文化的热爱和对浙江词学传统的尊重，都对浙江词学传统非常重视。如朱彝尊就曾用一种十分自豪的口吻谈到两宋间的浙江词家：“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唐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今所传《乐府补题》，大都越人制作也。”³¹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浙江词学传统的概念，但朱彝尊一一列举两宋间浙江著名的词家，意在说明浙江历来就有十分良好的文化积淀，以此鼓励浙江词家进行创作，增强其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派词人对浙江的词学传统更加重视。厉鹗是杭州人，对杭州的词人尤其关注。他说：“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芾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所称。”³²他不仅为两宋间著名的杭州词人列了一份名单，更重要的是推出周清真，强调其“为倚声家所宗”的事实。上述朱彝尊的话虽然也提到周邦彦，但主要将其视为一个浙江词家，从词学倾向上看，朱彝尊与早期浙西词人宗南宋、学姜张，并没有明确提出学周邦彦。其原因主要是周邦彦的词风与姜张有所差异，且张炎《词源》对周邦彦也有微词。但厉鹗不为所拘，将周邦彦列为大家，一方面固然是周邦彦本身的成就与地位所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浙江地域的情感因素。可见，无论是朱彝尊还是厉鹗，他们都重视浙江的词学传统，并对此感到自豪。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浙江词学传统的概念，但事实上有弘扬浙江词学传统并接续这一传统的想法。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清代的浙西词派，已经成了浙江词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

相比清人，我们更应该重视浙江的词学传统，更应该研究并弘扬浙江的词学传统，并将之视为浙江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浙江的词学研究实力很强，在研究与传承浙江词学传统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浙江历史上词人众多，留存的词学文献非常丰富，总量也很大，因此还有不少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词学文献的基础性研究，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随举一例。慈溪人冯开，为民国时期浙东名士，也是著名词人。其《回风堂词》一卷，存词四十余首，被朱祖谋收入《沧海遗音集》。但据沙孟海所撰《冯君木先生行状》，冯开“少好倚声”，“晚交桂林况周颐夔笙、吴兴朱孝臧古微，复多按度”，“遗著有回风堂文若干卷，诗若干卷，词若干卷，胜记若干卷，皆未刊”³³。其儿女亲家况周颐也在《餐樱庵漫笔》中称：“君木戊戌已编

旧著曰《秋辛词》”³⁴。可见其存词远不止《回风堂词》中的四十余首，尚有“词若干卷”未刊，这就需要我们加以搜集、整理。这样的浙江词人在民国时期不少，在清代也同样不少。因此发掘、整理历代浙江词人的词作、词集，尚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考虑编纂有一定规模、一定质量的《全浙词》，以全面展示历代浙江词人的创作风貌与创作实绩。另外，最近几十年，浙江在地域性词派研究方面取得进展，成果很多，但着眼于浙江全局性的词学研究尚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词史》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该书对浙江的词人、词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阐述，推进了对浙江词的整体性研究。但该书偏重于两宋部分，明清尤其是清代部分尚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的空间。因此，在《全浙词》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浙江的词史，也可以考虑列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选项中。

第二，将弘扬浙江词学传统与发展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结合起来，发掘词学研究的社会效用与应用价值。

词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不能追求功利性，但如果让词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服务于社会，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与应用价值，也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就浙江的词学研究而言，利用自身优势，将词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与发展地方的文化旅游事业结合起来，无疑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1918年，词学家、浙江富商周庆云买下杭州秋雪庵所在的土地，用三年时间加以重建，并在庵后盖了两浙词人祠堂，以此纪念历代浙江词人，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例。现在两浙词人祠堂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处人文景观，在弘扬浙江词学传统与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周庆云建两浙词人祠堂的举措，可以为我们建设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文化旅游事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事实上，浙江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如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与宣传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学术研究而言，唐诗之路已引起学者的注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使当下的唐诗研究更加丰富。从地方文化建设来看，唐诗之路无疑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借助这张名片，政府部门可以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推广当地的经济成果。至于发展文化旅游事业，这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当地政府只要认真加以规划，切实做好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使浙东唐诗之路成为优质的旅游资源。参照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路，浙西的词学资源也应该加以充分发掘与利用。杭嘉湖一带是浙江词学最发达的地区，堪称浙西词乡。词乡的提法并非今天才有，浙西词派中期领袖人物厉鹗为平湖词人张奕枢词集作序时就有这种说法，他说：“携李，今词乡也”。为了阐明这一点，他对嘉兴一带词学兴旺的状况作了具体描述：“自朱竹垞太史导其源，李秋锦、魏水村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称，南浔以秀淡胜，融谷以婉缛胜。于时一篇始出，四方传唱，敏若风雨，虽茶棹酒帆、井眉椒壁间，伟男髻女，皆能道其名字。”³⁵文中提到嘉兴的朱彝尊、李良年、魏琬、沈皤日、沈岸登五位词人中，朱彝尊、李良年、沈皤日、沈岸登四人均均为著名的“浙西六家”之一，魏琬虽没列入“浙西六家”，但也是有一定成就的词人。朱彝尊为其词集《水村琴趣》作序，以为其词“力追南渡作者”“不可多得”。另外，“浙西六家”中的李符也是嘉兴人。六家中，只有龚翔麟是杭州人。可见嘉兴一带词家众多，人才辈出。除了名家众多，嘉兴一带的词学土壤也相当好，“一篇始出，四方传唱”“虽茶棹酒帆、井眉椒壁间，伟男髻女，皆能道其名字”虽然是夸张，但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词在当地的群众基础。其实不仅是嘉兴一地，整个杭嘉湖地区都是如此。将这一区域称为词乡，完全没有问题。

杭嘉湖是江南的核心地域，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名人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这里依托星罗棋布的古镇，以名胜古迹与水乡自然风光为特色，在旅游业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如果能进一步利用当地的词学资源，将更多的人文要素融入到旅游业中，无疑将锦上添花。发掘词学资源，宣传浙西词乡，将进一步促进杭嘉湖地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浙东唐诗之路与浙西词学之乡两翼齐飞、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三，浙江词学传统要融入浙江现代文化的塑造中。

浙江历史悠久，这里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过程中，逐渐适应环境，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最近二十余年，浙江在总结、提炼浙江地域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要求，多次对浙江精神作出概括与描述。时至今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以及“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等浙江精神，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浙江精神的表述非常准确、精炼，既凝聚了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又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时代精神，在激发浙江人民创造热情、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浙江精神无疑是浙江文化的核心要素，但从浙江现代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不仅要体现出坚韧、务实等核心要素，还要反映出浙江文化中优雅、精致的一面。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浙江人民秉承浙江精神，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已经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浙江精神也因此为大家所熟悉。但相比之下，浙江文化中优雅、精致的一面还宣传得不够，这容易使人产生浙江仅是一个经济强省的印象，不利于浙江整体形象的塑造。事实上，浙江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领域均有非常好的学术传统，也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这些都是浙江文化的精髓，需要大力弘扬。就浙江词学传统而言，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浙江文化中雅致、精美的一面，需要我们加以发掘与宣扬。而从词学研究者来说，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富有现代文化价值，或者说，如何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现代文化建设之中，做到古为今用，也是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联系到浙江正在进行建设的“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词学研究也有一个主动融入的问题。宋韵文化内涵丰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多，但宋词作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浙江词学传统中，宋代和清代是两个重头，南宋又是宋代的重头，因此，研究浙江词学传统，本身也是“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一部分。

浙江词学传统绵延千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研究浙江词学传统的特点，探索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发掘其现代文化价值，是我们需要认真去做的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对得起这份遗产，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续并发展这一优秀的传统。

注释：

1 许伯卿先生将张志和《渔歌子》的创作定为浙江词的起点，参见其《浙江词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2 参见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载唐圭璋《词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页。

3 许伯卿：《浙江词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4 参见朱惠国《周济词学论著考略》，载《词学》第1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6)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3页。

6(7)许伯卿先生以为，“与同时代其他地区词家作横向比较，元明两代浙江词家更是表现不俗”。参见许伯卿《浙江词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9页。

7(8)张德瀛：《词微》，载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84页。

8(9)蔡桢：《柯亭词论》，载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08页。

9(10)吴自牧：《梦粱录》，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8编第5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10 11 21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40、2177页。

11 12 陆游：《老学庵笔记》，载陆游《陆游全集校注》第18册，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40页。

-
- 12 13 陆游：《〈傅给事外制集〉序》，载《陆游全集校注》第14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150页。
- 13 14 15 李心传编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胡坤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05、3320页。
- 14 16 夏承焘：《西湖与宋词》，载《夏承焘集》第8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 15 17 吴松弟：《南宋移民与临安文化》，《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 16 18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 17 19 欧阳修：《有美堂记》，载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85页。
- 18 20 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全宋笔记》第8编第3册，第332页。
- 19 22 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载叶适《叶适集》，刘公纯等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0页。
- 20 23 《浙江通志·风俗卷》“青田县志”条，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浙江》，凤凰出版社、巴蜀书社、上海书店2010年版，第1797页。
- 21 24 薛廷文：《梅里词绪弁言》，载《梅里词绪》，上海图书馆藏清稿本。
- 22 25 王庭：《梅里社稿序》，载杨谦编《梅里志》，道光五年刻本，第十四卷。
- 23 26 27 薛时雨：《梅里词辑序》，载沈爱莲编《梅里词辑》，清同治刻本。
- 24 28 朱彝尊：《词综发凡》，载朱彝尊、汪森编《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 25 29 朱彝尊：《水村琴趣序》，载沈松勤编《朱彝尊全集》第18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53页。
- 26 30 朱彝尊：《词综发凡》，载《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页。
- 27 31 35 李符：《红藕庄词序》，载《浙西六家词》，清康熙龚氏玉玲阁刻本。
- 28 32 汪森：《词综序》，载《词综》，第1页。
- 29 33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载《朱彝尊全集》第20册，第274页。
- 30 34 朱彝尊：《黑蝶斋诗馀序》，载《朱彝尊全集》第18册，第948页。
- 31 36 朱彝尊：《孟彦林词序》，载《朱彝尊全集》第18册，第951页。
- 32 37 厉鹗：《吴尺凫〈玲珑帘词〉序》，载《樊榭山房文集》，清刻本第四卷。

33 38 沙孟海：《沙孟海论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5 页。

34 39 况周颐：《餐樱庖漫笔》，载孙克强等编《民国词话丛编》第 1 册，社科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01 页。

35 40 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载《樊榭山房文集》，清刻本第四卷。